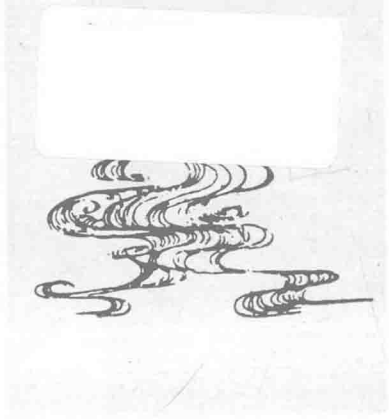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red background with a network of black, vein-like lines.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, there is a soft, glowing yellow-green circle. The title '陈残云文集' is printed vertically in white, bold, sans-serif characters.

陈
残
云
文
集

①



陈残云文集

陈残云文集编委会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陈残云

目 录

热带惊涛录	(1—504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章 孤岛新囚

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。

从香港启行的轮船“万福士”号，航行在太平洋上已是第四天了。一路来风平浪静，碧海蓝天，把离乡别井，抱着单纯的生活梦想的中国旅客，带进了景物奇异的热带。南洋群岛的第一个大都市新加坡，迷濛地显露在旅客们眼前的时候，轮船突然停住。另一艘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轮船，和它像同命运的伴侣一样，同时停泊在一起。

一个荒芜的小岛，和轮船靠得很近，有经验的“老客”们，很敏感，知道这个不祥的小岛，监狱似的折磨人和侮辱人的小岛，在等候他们。这就是棋樟山。英国的国旗傲慢地插在山巅，给它安上这个文雅的名字，而中国的旅客们，却都把它叫作硫黄山；因为每一个人到那里去，都被剥光衣服，赤条条的像牲畜一般，受到硫黄的蒸气和水淋的“消毒”。因此，硫黄山，是一个遭殃的痛苦别名。

统舱里的旅客们，大都是贫苦的劳动者，没有护照的“猪仔客”，他们和来自印度的贫苦的旅客有着同等的命运。在英国绅士的眼睛里，他们是不文明的、下贱的、肮脏的、从头到脚都附着

传染病细菌的贱民，所以好心肠的绅士们，要把他们送到硫黄山去“消毒”。自然，在同一艘船上的另一种客人：从中国发了抗战财，带着小老婆去度“蜜月”的贪官污吏；只会对外国老爷打恭作揖的外交官；以贵妇人身份出现的、穿插于官绅群中的高等交际花；脑满肠肥的工厂主和大商家，却是幸福的。他们是坐大台或二台的高贵客人，有着被另眼相看的特权。他们在船栏上站一会，悠闲地欣赏一下硫黄山的山光水色之后，不必上山，随原船欣然自得地到新加坡去。他们和英国绅士有着同样的感情，厌恶和轻视那些“有辱国体”的“贱民”。

但是，统舱里的猪仔客，并没有在别人的歧视眼色和虐待之下，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生存的意志。他们都是纯洁的、善良的，其中有些人，还带着生存以外的崇高理想，就是说，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理想而去奋斗。这些人中，人们认识一位杜青松。

正当轮船停止，舱里的客人们焦急、咒骂、惶惶不安的时候，杜青松却仍然那么安静地躺着，看自己的书。

“杜先生，还不起来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收拾行李，到硫黄山‘避暑’去！”

这一句含着嘲笑的俏皮话，是二十四岁的年青女佣亚秀说出来的。亚秀原是顺德县一间丝厂的女工，六年前丝厂倒闭，她活不下去，便随着堂婢飘零到马来亚，在怡保一个矿场和橡胶园主家里当女佣。三个月前，她接到母亲病危的信，赶着回家一看，原来母亲没有病，而是骗她回家结婚。她很反感，把几年来积存下来的一点钱留下给母亲，就立刻回到马来亚来。

亚秀对自己的家乡，是十分热爱的，第一次离开它的时候，曾经哭了几次，后来也常常作梦。家乡里的桑基、鱼塘、荔枝林、

芭蕉林，都有过她孩子时候的足迹；家乡里的神诞、戏会、元宵节、七姐会、姊妹屋，都是那么有趣地留在她的记忆里。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都喜欢拿家乡来相比，结论总是“我们的乡下比它好”，比香港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怡保都要好，好像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她的家乡。那是没有什么办法的，她的脑袋像石印板似的，牢牢地印着家乡里的秀丽的景物；就像所有的老华侨一样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

这一次回到家里去，她看见村子里颓垣败瓦，鱼塘毁坏了，桑树和荔枝树砍光了，姊妹们饿死的饿死，嫁人的嫁人，逃荒的逃荒，被侮辱的被侮辱，所有的乡村，都充满荒凉、凄惨的景象；而年老的母亲也被迫逃到容奇一个亲戚家里去。她痛苦、失望、愤怒，她痛恨那些毁坏自己家乡，无恶不作的日本强盗。

后来在容奇，她和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中年人会面——那是亲戚替她许下的未婚夫，她冷了半截，再一查探，才知道这家伙是个小汉奸。她把他骂了一顿就悄悄地溜走了。

现在，亚秀又远离家乡，回到马来亚了。一路来，她的心情是十分难受的。但意外的，或者说是使她感到愉快的，她结识了一个诚实的朋友杜青松。他是个中学教师，和蔼、亲切、老诚，像她念初小三年级时候所敬仰的端庄又慈和的老师。不同的是，有时候他又像个天真的孩子，在态度上，和她完全平等，没有一点架子。这一点，在她想来是异常难得的，一位有学识的中学老师，把一个微贱的女工看作是平等的朋友。

刚下船的时候，旅客拥挤不堪，都在东奔西窜地抢夺位置，她一早就占了一个很好的床位，把席子铺上，安安稳稳地坐着。而他却是斯斯文文的，提着一个半旧的皮箱，东张西望的等待别人对他安排。好半晌，座位都给人占满了，谁也没有理睬他，他显

得尴尬和不安。后来他看见她的床位较为宽广，就走过来，恳求似的：“让我坐一坐好吗？”她不立刻回答，随即觉得他有些可怜，便点头道：“你坐吧！”他带着感激的神态把皮箱放下。

夜里，人们身挨身地躺着，像罐头里的鲑鱼，又闷又热，他那一套咖啡色的厚绒西装，连脱也不脱就躺下来，一面连连揩汗，一面又害怕触动身边的人，竭力缩小自己的身体，但无论怎么缩都一样压住她半边手臂。

“太热啦，”她叫起来，“怎么不把衣服脱掉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……”杜青松小声回答。

“出洋过埠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怕什么？”她和气地笑道，“你是新客吧？”

他答道：“是的，第一次出国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“南洋有熟人？”

“有哥哥嫂嫂，还有熟悉的朋友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哥嫂在金宝，朋友在新加坡。”

“你要到金宝，可和我一块走，我是到怡保的，是一条路。”

“我去新加坡当中学教师，不是到金宝去。”

她完全以旅途上的“老客”姿态，对他直率地询问，虽然她年纪比他轻，而且有着男女之间的距离；但是她懂得一点一般华侨共有的良好传统，有责任对“新客”帮助和关照。而当他说出自己是中学教师时，她突然感到自己太鲁莽，对他不够尊敬，因此她拘束起来。

而杜青松却觉得她直率得可爱。就这样，他们熟识起来了，

变成好象早就熟悉了熟人。在几日的旅程上，他和她谈起国家大事，谈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暴行，谈汪精卫卖国求荣，谈国民党的贪污腐化，谈共产党抗日救国……这里面许多道理都是很新鲜的，她听得很有兴趣。他们在学识和对问题的理解上有较大悬殊，而热爱自己的国家，仇恨日本鬼子的感情是相通的。往后，他告诉她，他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，在战场上奔跑过，这使她越加敬佩。

然而，杜青松并没有把自己的许多事情都告诉她。比如说：他曾参加过抗敌团体，在抗日前线的军队中做过政治工作，遭受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“不准抗日”的迫害，他逃走了。比如说：他当中学教师时，国民党反动分子借口说他“煽惑青年”，要逮捕他，他逃跑了。比如说：他有一个不灭的理想，中国的劳动人民会战胜内外敌人的迫害，成为国家的主人。还有别的，总之生活当中的许多平凡的遭遇，以及精神上的激动、痛苦、憎恨、爱与仇、欢乐和忧虑……都没有告诉她。一个在寂寞的旅途上相遇的朋友，他想，有什么理由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她？是的，他没有必要对她，或对任何人，重述自己的微小的喜怒哀乐的经历。更没有理由告诉她，朋友们要他到南洋去不是为寻求个人的幸福，而是去追随海外的革命者、发展与祖国命运相连的崇高事业。虽然几日来在旅途中，他对她产生一种纯洁的友爱感情。

现在，亚秀对他已是无拘无束了。

大家都在心焦地议论着硫黄山的可怕情景的时候，杜青松却仍然聚精会神地看着书，这倒叫亚秀心急起来。她接着嚷道：“到了硫黄山，教你看书看肿眼睛，快起来吧。”

杜青松放下书，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，翻身起来。他的蓬松的头发，像乱草一样覆盖着脑袋，那长方形的，灰黑色的面孔，

像经历过许多风霜，显得苍老，眼尾出现了浅浅的皱纹。他一双明亮而沉静的眼睛，好像在思索什么，显然，他的外表和神态，和年龄不大相称，看不出他是生长在亚热带的生气蓬勃的广州青年。

他坐起来，淡然地瞥了亚秀一眼，沉声说：“你急什么，害怕硫黄山不肯收容你？”

亚秀急嘴道：“早走一步，可以抢个好床位。你不知道，山顶上的屋子像个监牢，闷死人啦。”

杜青松平静道：“大家都是监牢里的人，有什么好抢的？”

亚秀没有回话，径自捡拾自己的行李。她的零零碎碎的杂物很多，番薯干、白菜干、炒米饼、木屐、葵扇……都是廉价的家乡物品，放满一个藤箱和一个线络。她一面整理，一面暗笑道：“都是给人家带的，好像当了巡城马。”然后，她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龙眼干，捡出来重新裹好，很珍惜似地放进藤箱去。

有条有理地忙了一阵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她用手抹了一下弄皱了的衣襟，安然地盘坐着。杜青松静静地看着她，忽然露出一丝奇怪的笑。

亚秀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杜青松说：“你看你的衣服……”

亚秀低头一看，看见自己的灰白色的柳条竹纱衣衫，染上了淡淡的红印，禁不住笑起来。她的健康的浅黑色的面颊，笑起来格外愉快、格外温顺，她有着整齐的白牙齿，端正的鼻梁，黑而秀气的眼眉，也就显得格外美好。她笑得异常开朗。

杜青松打趣地问道：“你对这包龙眼干，好像有什么心事……”

“没有，”亚秀面孔有点微红，连连摇头，吊在后脑的黑得发

亮的大辫子，频频摆动着，“是替何广进买的。”

“哪个何广进？”

“我们‘头家’（老板）的汽车司机。”

杜青松还想问些什么，她却支起半截身子，双膝跪着，替他折毯子。随即转口道：“你们男子都是这样漏气，船不到岸不捡行李。”

靠在杜青松身边，有一位比亚秀年轻两年的青年，清瘦而苍白的面孔，尖下巴，头发梳得油光闪闪的，悄悄地捶了一拳杜青松的背脊，逗趣地插嘴道：“老杜，你真福气呀，有人替你铺床叠被。”

亚秀骂道：“你这刀子鬼，长了副歪嘴！”

“刀子鬼”就是那位青年的外号。他原是九龙一间下等理发店的小师傅，有一门好手艺，却总觉得出不了头，就凭着姐姐在新加坡一间理发店当女佣的关系，冒一冒险“走埠”。他叫做陈登，是个足球迷，替“铁头”谭江柏剪过一次发，念念不忘。他非常佩服老谭在球场上的勇敢。他爽直、有趣，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渺小，因为这样，他和杜青松、亚秀，都混得很熟，很喜欢开亚秀的玩笑。

亚秀对他的轻骂，他觉得很快活，他说：“要不，你为什么不替我叠一叠毯子？”

亚秀道：“到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就替你叠。”

“好，我闭上眼睛。”陈登大声说着。反身一躺，双脚伸得直挺挺的，把毯子蒙头蒙面的盖上。

杜青松和亚秀都忍不住发笑。

旁边一位少女跟着笑起来，笑声特别清脆。

“到了硫黄山你就苦啦，还这样快活！”跟这少女腿并腿坐

在一起的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妇人，她带着烦躁的情绪责备陈登。

这胖妇人不知叫什么名字，陈登最初喊她作“胖婶”，人们也跟着喊，她也承认自己是“胖婶”。她是少女的母亲。她着实胖得不寻常，面孔像个油腻的大面包，双下巴，她很喜欢说话，说起话来，下巴的肥肉频频震动。她穿着马来亚妇女常穿的对胸薄衣，把肥肿的腰身和大乳房裹得很紧。她是海南岛人，在南洋生长，是新加坡一间咖啡店的“头家娘”。那少女是她的独生女儿，叫文娟，十九岁，南洋女中的学生，嚷着要回祖国升学，胖婶劝她不了，又舍不得她独个儿离开，就陪她一起回国。哪晓得到了香港，交通阻塞，连文娟也没有勇气走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，便怏怏然地回到南洋来。

回来，在胖婶想来是十分高兴的，但当她眼看就要回到家的时候，却要留在硫黄山消毒，这就叫她心焦起来。

“胖婶，”陈登露出半边脑袋，气弄地叫道，“就怕把你的肥膏都熬出来啦！”

胖婶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这刀子鬼，老是不正经，剃头不割破人家的脑袋才怪！”

“我顶会替你们女人烫头发。”陈登拉长声调说，“我替你烫个美国明星的飞机头好不好？保险你年青十年。”

“死鬼子，”胖婶忍不住笑，“你顶多有一点替亚秀剪掉辫子的本领。”

“对呀，我剪过许多大姑娘的辫子。”陈登一骨碌地翻起身来，面向亚秀取笑道，“亚秀，我剪子都带来了，替你剪掉这条猪尾巴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剪！”亚秀说。

陈登说：“不剪，将来当了头家娘不够派头。”

亚秀把叠好的毯子顺手一推，跳过杜青松的铺位，想去打陈登。陈登迅速站立着，张开两腿，作出一个足球守门员的姿势，准备等她扑过来，他就把她的辫子抓住。但亚秀并没有扑过去，她一只手护卫着自己的辫子，一只手捏成拳头，探试前进。她的拳头像一只男人的拳头，结实而有威力，陈登害怕三分，他退缩一步，亚秀迫前两步，陈登有点窘态。

许多陌生的眼睛都在凑趣地欣赏他们。

文娟稚气地笑着，她的白嫩的鹅蛋形的面孔，露出一个纯真的酒涡，她的大眼睛眯成一条细缝，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紧攥着自己的黑裙。显然，她害怕那位瘦弱的理发师经不起亚秀的拳头。

“算了吧，亚秀。”杜青松叫住她。他好像觉得她这种过于认真的举止，会引起人们一阵低级的讪笑。

亚秀继续追迫道：“你不认错，我打歪你的嘴！”

陈登装个鬼脸：“好啦，我认错，头家娘……”

亚秀更气，她高高地举起拳头打下去，陈登用手一格，又往后退缩。不提防有一个人暗暗地伸出一只脚来，轻轻一撬，把他撬跌在地，他的后脑正好撞在一只硬皮箱上，他抚摸着脑袋哎呀地叫喊，引得人们不约而同地笑起来，那伸脚的人笑得更起劲。而亚秀的拳头却松开了，她怜悯似地把陈登拖起，笑道：“活该！”

“妈的，四眼光。”陈登一把抓住那人的头发，半玩笑半责骂，“你这阴谋家！”

那人叫温国光，“四眼光”是陈登给他安上的浑名。他三十多岁，并不近视，却老是带上墨晶眼镜，生怕有人知道他患有严重的砂眼似的。他的头发比陈登梳得更滑溜，面色却比陈登还要苍

白，因为镶了一只当门的金牙，使他的脸色显得更苍白。而他的态度很斯文，不大讲话，除了喜欢跟文娟和胖婶攀谈之外，对别的人经常保持自己的冷静和缄默。胖婶母女和杜青松几个人，由于生活上的互相关照，年轻人的不甘寂寞的情趣，彼此无形中就结成了一个“小集团”，四眼光之所以成为这个小集团里的一员，也就因为他对文娟有着一一种隐蔽的心事。但他过去干什么，到南洋去又干什么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过是个新闻记者。杜青松看出他没有什么学问，即使当记者也顶多是个黄色记者。陈登却觉得他像个在吴淞街——九龙一个下等妓女的集中地——吃“软饭”的货色。亚秀则厌恶他那双隐藏在墨晶眼镜里的不正派的眼睛。而温国光对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：杜青松是个有头脑的沉静的知识分子，可以交一交手，亚秀和陈登是身份低贱的工人，瞧不上眼，叫他奇怪的倒是老杜为什么跟他们搭上了朋友。

陈登不管四眼光心里如何想，反正他也不把他放在眼内。他使劲地拧着他的头发，一面得意地摇晃，一面报复似地叫道：“还不敢不敢，敢不敢？你说！”

“放手！”四眼光缩起双肩，想发气又发不出来，扯起难看的面孔。

“不放！”陈登神气地说着，顺手又抓去他的眼镜，“你叫一声‘契哥’，我就放你。”

众人的眼线转向到四眼光的身上。胖婶唯恐陈登把四眼光的头发扯掉似的，调解道：“刀子鬼，放手呀，别把他的头发拔掉呀。”

陈登笑道：“拔掉了就叫他当和尚。”

文娟咕咕地笑起来，她像欣赏着耍猴子似的，眯起了天真的

眼睛。

“要他叩个响头。”亚秀鼓动着陈登。

“好，”陈登用力地压低他的脑袋，“叩头，叩头！”

四眼光的面孔发白又发红，真的要生气了。杜青松害怕弄假成真，当真翻脸，便立刻走过去，拨开陈登的手，半庄重半和解道：“够啦，够啦，别叫老温出丑。”

陈登松了手，像胜利者似的：“四眼光，还敢不敢耍阴谋？”然后把眼镜交还他。

四眼光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似的，十分难过，但他又不好发气。他抹平自己的头发，把眼镜带上，悄悄地打量文娟一眼，强笑一下，表示自己毫不在意。

“上岸啦，上岸啦，”胖婶突然又叫起来，她用手指一指四眼光，关切道，“你还不收拾行李？”说着，胖婶叫文娟去帮忙他，文娟装着叫不见。胖婶自己走过去，亲热地责骂一句，“你们男人都是懒鬼。”

这一骂，骂得四眼光满舒服，刚才那一点晦气都消了，他觉得胖婶很可爱，她的善意的声音，和她的挂在脖子上的黄澄澄的大金链，一样地可爱。或者说，她的慈祥和文娟的天真，同样可爱。

上岸的时候，四眼光眼见胖婶行李多，走动不方便，想着力关照她一下，但他自己一个大皮箱已经提得很吃力，要陈登帮他一手，才上得码头。结果，倒是亚秀兼顾她两件行李，杜青松扶她上岸。这样，他们六个人连结在一起，随着不安的囚犯似的旅客群，在火烧般的阳光炙晒下，上了硫黄山去。

硫黄山是一个孤岛，没有村庄，没有市场，只有杂乱的成林或不成林的杂树，和一株株疏落的椰子树。海边有一个简陋的码头，大概是专为“囚徒”们而设的，山谷或山坡之间，有一些单独的洋房，和星铁盖顶的牛栏一样的大仓房。洋房与仓房涂着不同的颜色，住着不同的人。杜青松听什么人说，这孤岛同时是个“集中营”，远东各地来不及撤退的德国侨民，或作恶多端的希特勒分子，都囚禁在这个集中营里。杜青松跟着人们上了山，果然看见俘虏，在草坪上洋洋自得地打着网球。这不禁使他想到，邱吉尔们对敌国的俘虏，比对中国平民来得文明与厚道。这大概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肤色，有与希特勒相似的精神世界的缘故。

杜青松走进酷热的塞满架床的仓房里去，心里很难受，感到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。他是一个有自己的祖国，有自己的尊严的人，而不是奴隶。可是不管他怎么想，他已经被送到小山头上，四面是铁栅围着的，又有印度警察监守着的地方来了。他和另一个山岗上的来自印度的旅客一样，遭受着相同的奴隶般的囚禁。那样多的善良的中国人和印度人，竟比不上那些肮脏的希特勒间谍……这么一想，不禁又引起他更多的感慨，一个衰弱的国家——当权者卖国求荣的、丧失了独立主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，它的人民处处都要受到虐待。因为是第一次出国，他的爱国感情特别强烈，因而他的抱负更加坚定：“我们的国家必须改变这种可悲的命运！”

这一晚，杜青松躺在粗硬的架床上，想到自己的祖国。

“他妈的！”睡在他身旁的陈登，不断地咒骂道，“英国鬼子把我们当作监犯！”

躺在杜青松另一旁的亚秀搭讪道：“谁叫你是穷鬼，不坐大台？”

“穷鬼就活该受罪？”陈登心里焦躁，加上空气闷热，翻起身来，抹一抹额上的汗，把一件贴身的线背心脱掉，赤身而坐，“有一天，我发了财，叫两个洋鬼子看守门口，痛快痛快。”

“别作梦，”亚秀说，“有工做，有饭吃，当一辈子剃头师傅你算够运啦。”

“不！”陈登道，“胖婶说过，槟城一位大财主剃头二，不是当剃头师傅的么？你怎么就小看陈登？”

“人家剃头二人品好，有人送他一个妾侍作老婆，夫凭妻贵，发了福。”亚秀顿一顿，问道，“你呢，你陈登有这个福分？”

陈登道：“我才不稀罕吃女人软饭……”

他们的话一句句进入杜青松的耳内，扰乱了他的思绪，他睁眼一望，看见亚秀也坐起来，他低声叫：“别打扰人家睡觉。”

“这么早，腰骨都睡断啦，谁也睡不着。”陈登说着，悄悄地搔一下老杜的胳肢窝，老杜本能地翻一翻身，不经意把半边面颊贴住亚秀的腿胫，亚秀缩一下，撞着背后的文娟，文娟哎哟一叫。陈登微微发笑。

杜青松也坐起来，轻轻地扭了一把陈登的膀子，带笑道：“睡不着觉就做发财梦。”陈登道：“不做梦，怎么消得这口委屈气？”

“许多发了财的人，不是一样当洋奴？”杜青松盘着腿子，悠然说，“你看，我们这些穷苦人，一辈子都发不了财的，要消气，只有国家强盛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陈登摊开双手。

“可是人人都想着发财，国家是不会强盛的，”杜青松转过面孔，“亚秀，你说对不对？”